

第四卷·第二期(总第九期)

The Review of New Political Economy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9

汪丁丁 主编

汪丁丁 经济利益，个人权利，自我与社会

李坤望 保护待售模型的经验检验——一个文献综述
王孝松

卢周来 利益不一致、补偿可行性与国家承诺——
中国改革困境及其化解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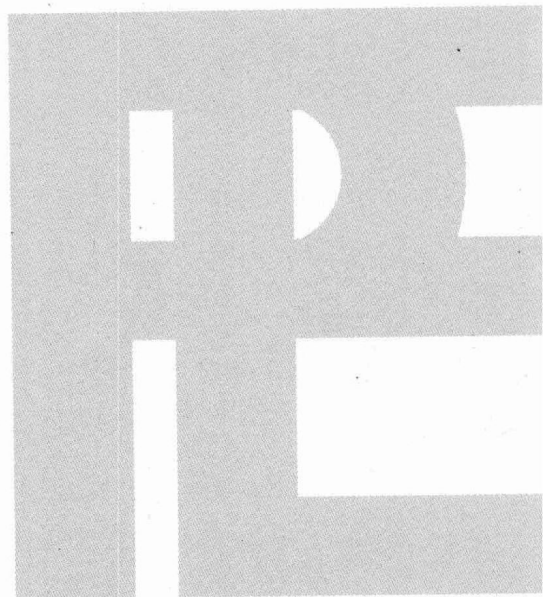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第四卷 · 第二期 (总第九期)

The Review of New Political Economy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9

汪丁丁 主编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9/汪丁丁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 - 7 - 308 - 05917 - 6

I. 新... II. 汪... III. 政治经济学—文集 IV. F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5958 号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9

汪丁丁 主编

策划编辑 王志毅

责任编辑 王志毅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出 品 浙江大学出版社 北京出版中心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8.75

字 数 153 千字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05917 - 6

定 价 25.00 元

The Review of New Political Economy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The Review of New Political Economy

主 编：汪丁丁

副主编：金祥荣

编辑部主任：叶建亮 朱希伟

编辑部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志毅 叶 航 宋华盛 汪淼军 陈志俊
罗卫东 罗德明 钱彦敏 曹正汉 黄先海
蒋岳祥 董毅青 潘士远

目 录

论文

经济利益，个人权利，自我与社会 ◆ 汪丁丁 · 1

保护待售模型的经验检验——一个文献综述 ◆ 李坤望 王孝松 · 11

利益不一致、补偿可行性与国家承诺——中国改革困境及其化解 ◆ 卢周来 · 37

再论村级经济治理和有效委托机制设计 ◆ 董直庆 王林辉 · 55

论家庭主义 ◆ 盛 洪 · 72

关于“论家庭主义”的评论 ◆ 陈志武 · 98

思想随笔

关于哈耶克自发秩序思想的三大误解 ◆ 朱海就 · 105

民主的条件与局限及其对民主化的启示——班级事务的决策逻辑 ◆ 赵德余 · 122

会议简讯 ◆ · 133

稿约 ◆ · 135

CONTENTS

Papers

Economic Interests, Individual Rights, Self and Society ◆ *Wang Dingding* · 1

Empirical Tests of the Protection for Sale Model: A Literature Review

◆ *Li Kunwang* *Wang Xiaosong* · 11

Heterogeneity of Interests, Feasibility of Compensation and State's Commitment—The
Dilemma of China's Reform and its Resolution ◆ *Lu Zhoulai* · 37

A Restudy of Country's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the Efficient Principal Mechanism Designing

◆ *Dong Zhiqing* *Wang Linhui* · 55

On Familism ◆ *Sheng Hong* · 72

A Comment on "On Familism" ◆ *Chen Zhiwu* · 98

Social Thoughts

On Three Misunderstandings of Hayek's Idea of Spontaneous Order ◆ *Zhu Haijiu* · 105

Condition and Limitation of Democracy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Democratization: Decision Logic of Collective Affair Conference Information ◆ *Zhao Deyu* · 122

Conference Review ◆ · 133

经济利益，个人权利，自我与社会

◎汪丁丁*

一、引言

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社会和谐问题日益凸显。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及其恶化或改善，是政治权力结构和经济权利结构变动的结果。各项可实施的福利政策，只要不改变权力与权利的结构，就是“治标”而非“治本”。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可以借鉴西方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将权力和权利的界定过程视为“社会博弈”——即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协调的过程。这篇文章旨在探讨社会博弈的行为经济学基础。思想通常是由表及里的。首先是“利益”概念，其次是“权利”概念，最后是“自我与社会的共生演化”概念。思想的逻辑表达通常是由内而外的。博弈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三者均假设已经存在着清晰界定了的“自我”和每一自我可能发生的偏好，然后假设存在着资源的初始配置或由这些初始条件界定了的可选方案的集合，最后研究这些自我所选择的行动方案之间的相容性。相容的行动方案，不论具有何种性质，总可以视为下一时段类似过程的初始条件，依此类推，可以有演化社会的诸种理论。行为科学与行为经济学诸理论，可视为是对上述研究方法的补充。这里，首先，“行为”是可观测的，但不必是理性的，至少，不必符合经济学所假设的那种理性。其次，“自我”不仅有身体而且是有情感和有社会意识的自我。最后，由这样的自我及其行为所构成的群体反作用于每一自我及其行为，导致了自我与社会的共生演化。目前，西方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尚处于支离阶段，尚不能形成理论体系。中国的经济学家，借助于中国文化与思想传统所提供的优势，不仅有能力学习行为经济学，而且有可能为这一学科建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以下分别论述“自我”、“利益”、“权利”三项基本概念的行为经济学内涵。

二、社会自我与情感自我

经济学的“自我”概念其实是身体的自我而非社会的和情感的自我，只不过，很尴尬地，

* 汪丁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身体自我”被假设具有“完备理性”，于是它追求多巴胺分泌水平最大化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模型，既不理性——它对例如“上瘾性”这样的现象提供的解释要么是不可信的要么是牵强的，也太偏离现实——根本没有这样的脑模型，不论是人脑还是一般动物的脑。所以，澄清自我的社会本质和情感本质，对经济学未来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对行为科学的“自我”概念影响最大的行为学家，我认为是米德（G. H. Mead）。他在《哲学杂志》1913年发表的文章“社会自我”，基于他自己对动物和儿童姿态的符号互动论研究（米德，2005，第二篇），基于达尔文和冯特（Wilhelm Wundt）关于表情与姿态的解释，提出了一个他称为“社会自我”（social self）的概念（米德，2005，第三篇）。

根据我对米德思想的理解，社会自我或“自我的社会本质”是这样形成的：在给定情境 S 内的个体 j 的姿态 X^j ，可引发其他个体 k 对 X^j 的反应 $Y^k(X^j)$ ， $k=1, 2, \dots, M$ 。设群体内的个体数目是 N ，如果对 X^j 有相同反应的个体的数目足够多，即 M 足够接近 N ，则 j 可形成对姿态 X^j 所引发行为的预期 $Y^j(X^j)$ ，而且，基于个体 j 对 Y^k 所产生的各种效果的认知，行为 $Y^j(X^j)$ 的价值是可以预期的。注意， Y^j 是 j 想象中的其他个体的行为 $Y^k(X^j)$ ， $k=1, 2, \dots, M$ 。因此，当 j 想象（预期）这些行为时，在想象的世界里形成的是一个社会交往过程，即米德所谓“内置的对话”——或“主我”（即个体 j 的身份）与“宾我”（即个体 j 以另一个体 k 的身份）之间的对话。符号 X^j 的意义，首先依赖于情境 S ，其次依赖于它对其他个体的意义——这些意义导致行为 $Y^k(X^j)$ ， $k=1, 2, \dots, M$ ，最后依赖于个体 j 对其他个体的行为的认知与预期 $Y^j(X^j)$ 。

儿童习得语言的过程，同时就是将社会内置于心灵的过程。“当这种姿态的会话进入个体的行动，使得其他有机体的态度能影响该有机体，而且该有机体能用它相应的姿态做出回答并在他自己的过程中唤起他人的态度时，一个自我便产生了”（米德，2005，页131）。符号意义的这一形成过程可以进一步演变为符号的逻辑意义的形成过程，即个体 j 对于包括数目 N 在内的更多个体的数目“ N 趋于无穷”——所谓“泛化的他人”，想象这些个体之间的社会交往，可以导致普遍的意义 $Y^j(X^j)$ 。米德指出：“从行为主义的观点看，思想和理性的这种普遍性和非个人性，是特定个体采取他人对自己所持态度的结果，是他最后把所有这些特殊态度具体化为一种态度或观点的结果，而他得出的这种观点可称为‘泛化的他人’的观点”（米德，2005，页71）。

沿着米德的思路，芝加哥社会学派的领袖人物布鲁默尔（Herbert Blumer，1955年被选为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确立了被称为“符号互动主义”的社会交往理论，成为当代最重要的社会理论之一。该理论最核心的假设（Blumer，1986，页78—89），我认为可概括如下：（1）符号是

一切意义的载体；(2) 意义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发生、形成、演化；(3) 社会通过这些符号互动的过程被嵌入于每一个体的心灵从而成为真实的社会；(4) 一切社会现象都可被还原为符号互动过程并由此获得解释；(5) 符号互动过程为人类行为提供意义；(6) 人类思想是内置的符号互动过程。

沿着达尔文—冯特—米德—布鲁墨尔的思路，“社会自我”或“自我”的社会本质被揭示出来，今天已成为行为科学和心理学领域里的研究者们的共识。

过去 10 年，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路向，是将“正义感”或它的特殊形式“公平”，引入博弈论和经济学，从而修正经济学家对理性行为的预期方式（Rabin, 1993; Nowak, Page and Sigmund, 2000; Nelson, 2001; Camerer and Thaler, 2003; Singer et al., 2004; de Vignemont and Singer, 2006; Henrich and Henrich, 2006）。米德的“社会自我”学说为这一研究路向提供了心理学和社会行为学基础。因为，正义感和仁慈感，是社会性动物长期演化而形成的两种基本的社会情感。它们的发生，按照休谟的看法，起源于个体之间相互同情的能力。当这一同情被应用于其他个体所遭遇的痛苦时，就发生“正义感”。而这一同情被应用于其他个体所得到的幸福时，就发生“仁慈感”。

事实上，与上述研究路向密切相关的，是行为经济学最近几年的一个研究主题——带有同情心的博弈行为（Sally, 2001）。上引 Singer 等人的脑科学研究，为“同情”行为提供了神经生理学基础。

另一方面，行为经济学研究也已经将“仁慈感”引入到经济分析当中来了。这就是以桑塔费学派为主导的关于“利他主义”与人类合作行为的研究成果（Gintis et al., 2003; Fehr and Rockenbach, 2004; Nowak, 2006）。

以上各项研究，在整体上已构成“自我”的情感实质，或者，可称为“情感自我”。这一心智结构就演化阶段而言早于“社会自我”的发生，根据脑科学界公认的麦克林“三元”脑结构学说（汪丁丁，2005，第一讲），情感的脑结构形成于人类的哺乳动物远祖的演化时期，即“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最初的情感发生器是杏仁核（amygdala），当母兽试图辨识幼兽声音里可能包含的求助信号时，这一脑区就被激活。

晚近的研究报告显示，情感脑或“哺乳动物脑”的区域不局限于边缘系统（LeDoux et al., 2006）。但人类的三种最基本的情感——幸福感、悲伤感、恐惧感，分别源自边缘系统的尾核、隔膜、杏仁核（Coleman, 1995; Das et al., 2005; LeDoux, 2002）。

不同的情感源自不同的脑区，所以人类常困于情感冲突。例如，源自尾核系统的幸福感与源自隔膜系统的悲伤感同时发生，导致“悲喜交集”的感觉。类似地，我们还有“爱恨相交”、

“希望与恐惧”、“嫉妒与幸福”、“将信将疑”、“惆怅”、“犹豫”以及更加高级和复杂的道德情感体验。与人类情感所呈现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发生的，是人类社会交往活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前引 Singer 等人（2006）最近的报告表明，人类的脑内存在一种被作者们称为“共享情感的神经网络”（shared affective neuronal networks）的心智结构。这一心智结构，很可能是从“镜像神经元”系统演化而来的。后者被发现存在于诸如恒河猴脑内，当个体的视觉脑“见到”另一个体的某一动作——例如手的动作时，激活并发出模仿信号。因此，镜像神经元系统为高级哺乳动物的模仿能力提供了生理基础。又根据一份晚近发表的关于自闭症儿童脑电图的研究报告（Oberman et al., 2005），自闭症儿童的镜像神经元激活对脑电“ μ -波”的抑制过程，在这些儿童自己的手动动作时可被观测到，但在他们视觉所见的其他儿童的手动作时不被观测到。这一发现意味着，自闭症儿童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失灵，并且这一现象与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的缺失显著相关。

根据 Singer 等人的论文，共享情感的神经网络有两项基本功能。其一，在特定情境内，位于哺乳动物脑区的共享情感的神经网络远比位于大脑皮质的理性神经网络有更迅速并且往往更正确的反应。由于这一功能，哺乳动物个体可以获得对某些特定危险或利益的“直觉”的认知。其二，在特定情境内，共享着情感神经网络的许多动物个体可以协调行动。不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危机应对中，这一功能都可强化群体内个体成员的社会性。基于社会情感网络的这一协调功能，许多社会性动物能够建立自己的产权制度。

远早于 Singer 等人，米德在 1922 年发表于《哲学杂志》的一篇文章里，将“制度”界说为群体成员对同一姿态的全体一致的反应。他并且以对“偷窃”姿态的反应为例，说明了财产权利的起源（米德，2005，页 131）。

这样，我们看到，每一个经济人的自我，其实都是三重的：身体自我、情感自我、社会自我。基于“完备理性”假设的经济人，已经预先排除了情感自我与社会自我。一旦我们试图偏离完备理性假设，我们处处都会遇到经济人的情感自我（正义、嫉妒、怨恨、内在幸福）与社会自我（道德判断、文化传统、信仰与自我实现）。真实的理性选择，总是这三重自我在三个不同维度（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的、往往相互冲突的诉求达成某种协调的结果。

三、兴趣、利益、经济利益

自我在上述三个相互有所重叠的维度上的诸多诉求，不论是物质的——身体自我的诉求，

或是精神的——情感自我的诉求，还是社会的——社会自我的诉求，总是表现为“兴趣”（interests）。这一语词在中文传统里有远比“利益”（interests）宽泛得多的涵义，尽管这两个中文语词对应着同一个英文单词。

从心理学视角看，兴趣决定注意力的方向和强度。心理学家尚未完全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兴趣是否必须进入意识？换句话说，很可能存在着远比我们意识到的兴趣种类更多的无意识的兴趣。今天，多数心理学家接受这一看法。

在引发注意或“好奇心”的几乎无数种类的兴趣当中，只有一小部分可以称为“利益”——政治的、经济的、社区的、宗教的、文化的等等。在人类关心的诸多利益当中，经济利益及其获取方式，是经济学研究的主题。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脑科学知识在经济学家当中迅速普及，从而我们应重新界定“经济利益”这一概念。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应对经济学思想史作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概括性的回顾。

由马歇尔集大成并发展至今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实源自两个不同的思想传统。其一是休谟和斯密的苏格兰启蒙思想传统，其二是边沁和密尔的英格兰功利主义传统。前者远比后者深沉和幽暗，因此，斯密的经济学和道德哲学含有一些悲观的基调，并且在他的晚年，这一悲观基调越来越强烈（汪丁丁，2007）。即便在《国富论》里，斯密也一再阐述他认为正确的幸福观，他对“美国道路”的评价和对“西欧道路”的评价使读者难以忽视他毕生关于“幸福”的斯多亚式的看法。

与斯密的幸福观完全不同，边沁将幸福等同于“快乐”，从而，他的经济学简单地就是“快乐”和“痛苦”的计算。这一简约主义的经济学传统，对转向社会主义之前的小密尔产生了重大影响。如马歇尔所说，小密尔几乎是19世纪中叶至末叶英国硕果仅存的经济学家。在他的影响下，包括边际效用理论在内的经济学传统，总是倾向于将“幸福”（happiness）简约为“快乐”（pleasure），从而英格兰的经济学日益远离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传统，也日益远离中世纪后期传至苏格兰的人文主义道德哲学传统（Knight, 1922, 1923）。

在脑科学流行的时代，边沁的经济学进一步蜕变为享乐主义（hedonism）经济学，将一切行为的意义等同于由尾状体和尾核系统控制的多巴胺分泌水平（Sanfey, 2004; Glimcher, 2005）。也就是说，今天，经济学蜕变为研究关于身体自我获得快感的理性选择的科学。

幸福（以“ H ”表示）是身体自我（以“ BS ”表示）、情感自我（以“ ES ”表示）、社会自我（以“ SS ”表示）的全部感受的综合，姑且记作函数“ $H(BS, ES, SS)$ ”，显然，它是一个生命过程，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仅当个体生命终结的那一时刻，它才获得完整的度量。不过，每一理性个体仍可在生命远未结束时相当准确地预期自己生命的终结时刻并据此将幸福函数的

可能状态逆向推演到当前时刻,从而使选择能够被“理性化”。

对个体 j 而言,经济利益是被这一幸福过程 H^j 的“经济的”兴趣激发出来的注意力在现实中关注的诸对象的集合 X 与 H^j 之间的关系,不妨记作“ $\{H^j, X\}$ ”。 j 的每一可想象的行为 X^j 及由此引发的他人反应 Y^j (X^j),在 H^j 评价标准下,与其他行为相比,可有一确定的价值排序。评价标准对价值排序的影响是三重的,分别基于 BS , ES , SS ,且这一标准随生命和经验的积累而演变。换句话说,假如 BS , ES , SS 各自的全部可能状态的集合分别记作 $\{BS\}$ 、 $\{ES\}$ 、 $\{SS\}$,则关系 $\{H^j, X\}$ 依赖于 H^j 在笛卡尔乘积 $\{BS\} \times \{ES\} \times \{SS\}$ 上的取值,并且随这一取值的特定路径生成 j 对经济行为的价值排序的特定变动过程。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这样的:设群体内个体的数目 N ,设每一个体的价值排序 H^k , $k=1, 2, \dots, N$,假如存在每一个体想象中的一组行为 Y^k (X^k), $k=1, 2, \dots, N$,使得 Y^k 在 k 的评价标准下有最高的价值排序, $k=1, 2, \dots, N$,那么,行为或姿态 $\{X^k\} 1^N$ 就是这一群体内的一个均衡状态。这一均衡可能转瞬即逝,因为任何个体的自我在集合 $\{BS\}$ 、 $\{ES\}$ 或 $\{SS\}$ 上取值的变动都可导致均衡瓦解。新的均衡需要新的想象——即每一个体的内置了的社会交往过程。

例如,均衡可能因为一些社会成员的 ES 和 SS 取值逐渐产生了强烈的正义感而瓦解,也可能因为一些社会成员的 ES 和 SS 取值逐渐转向“冷漠感”或“反社会人格”而瓦解。

四、权利、权利意识与社会演化

所谓“自我意识”,就是意识到在上述 $\{BS\}$ 、 $\{ES\}$ 、 $\{SS\}$ 三集合内特定取值的自我的意识。与身体自我的边界和情感自我的边界相比,社会自我的边界通常是最模糊的。惟其如此,当自我意识觉醒之后,人类社会的演化诱致了“财产权利”这一现象,从而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往往认同于他所拥有的广义产权——洛克定义产权为“生命”、“自由”、“财产”。

休谟指出,幸福有三种来源,其一是身体的——例如美貌和健康,其二是情感的——例如受人爱戴和尊敬,其三是财富。这样三种幸福的来源,前两种无法被转让或以暴力剥夺,唯有第三种,是可以转让或可以暴力剥夺的。

经济利益的博弈,通常要求清晰界定了的权利。其实,更彻底的逻辑要求权利与利益在同一社会博弈过程中得到界定(Knight, 1942, 1944; 汪丁丁, 1996)。所以,社会博弈是公共选择过程的逻辑表达。

仍借助于符号表达,个体 j 想象中的经济利益是关系 $\{H^j, X\}$,其中, X 包含的由 j 在当前

时刻能够直接实施的行为的集合，记作 $\{X\}^j$ 。显然， j 能够实施的行为——例如偷窃或抢劫，未必都是他有权利实施的行为。反之， j 有权利实施的行为的集合可能包含一些行为是他不能够实施的，例如对外太空的权利或对所属国领海的权利。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 $\{X\}^j$ 包含着 j 的权利束，用映射 $R^j(\{X\}^j)$ 来表示，它把集合 $\{X\}^j$ 映射为 $\{X\}^j$ 的一个子集。关于权利的形式化理论，在 1980 年代初期令人振奋的几篇论文之后（Gardenfors, 1981；Gaertner, Pattanaik and Suzumura, 1992；Pattanaik, et al., 1997），几陷于停滞，至今尚无突破性的进展。

现在，对 j 而言，关系 $\{H^j, X\}$ 被限制为关系 $\{H^j, R^j(\{X\}^j)\}$ 。这一限制来自公共选择过程，是群体内部诸成员的价值排序及评价标准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结果尤其依赖于群体内的那些被认为具有重要性的成员们关于评价标准所达成的共识（Knight, 1942, 1944, 1946；Arrow, 1951，特别是第 89–91 页）。

设群体内个体的数目 N ，被认为具有重要性的个体（精英）的数目 M ，这些精英的权利束 $\{R^e(\{X\}^e)\} 1^M$ ，及精英们的评价标准 $\{H^e\} 1^M$ ，由精英主导的公共选择 F ，定义域是一切逻辑可能的偏好 $\{\{H^e\} 1^M\}$ 和一切逻辑可能的权利体系 $\{\{R^k(\{X\}^k)\} 1^N\}$ 的笛卡尔乘积上，于是：

$$F(\{R^e(\{X\}^e)\} 1^M, \{\{R^k(\{X\}^k)\} 1^N\}) = \{R^k(\{X\}^k)\} 1^N$$

界定了每一社会成员的权利束。这样，不属于精英群体的社会成员，他们的价值排序和评价标准，通常难以获得政治表达，从而他们在权利界定的社会博弈中获得的权利束通常便残缺不全甚至完全缺失——权利的实施意味着其他社会成员对权利主体的义务，弱势群体权利的实施意味着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义务。

如果个体 j 不属于精英群体，那么，可能的理由是：（1）他不具有重要性，可是谁来界定重要性呢？根据社会的自然演化学说，那些已经具有重要性的成员们达成关于社会成员重要性的标准的共识，这一共识当然也适用于他们自己（Knight, 1944）；（2）他可以具有重要性，但他缺乏权利意识。例如，农民和工人，至少仍享有宪法规定的多项重要权利。他们当中的相当多数已经有了权利意识，但根据一些调查者的报告，尚未获得自觉维护自己权利的决心；（3）即便已经有了维护权利的决心，这一弱势群体还需要协调信号，才可能将个体意志集聚为政治影响力。通常，是那些重大的社会事件提供了这一协调信号。当然，前提是大众媒体对这些负面事件的广泛报道；（4）可是，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一次重大事件都可导致弱势群体的权利扩展。因为，有了协调信号，还需要有奥尔森说的“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s）。这一激励诱致少数恰当的人将自己的企业家（政治家）能力投入于弱势群体的权利诉求，将他们的诉求以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成为政治的诉求。他们往往来自精英群体，由于他们的表达足

够恰当——合法性、合理性、合道德性，所以容易获得各既得利益群体的政治支持；（5）社会演化的最后途径，是演化转变为激进的。于是，弱势群体的权利诉求得以爆发，怨恨得以宣泄。当然，大范围的失序将造成难以弥合的社会创伤。

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自由有特定的涵义。例如，1920年代末期，杜威曾呼吁：“自由，就是从物质的无保障状态得到解脱。”基本生活保障、住房、就业、教育、普选权、个体发展，所有这些，或迟或早总会被政治家们表达出来，成为大众的权利诉求。

因此，一个社会能够演化到何种文明高度，最终取决于这一社会的精英群体能够在何种程度上保持宽容、开放、明智和自我批判的态度，从而在相应程度上保持着恰当的纵向流动性，以及相应地，让精英群体分享的权利以相应的程度不断扩展到弱势群体（Knight, 1942, 1946）。所有这些品质，以集结算子 F 的形式得到表达，并随时间有所改变。

以上概括，大致就是社会演化的形式表达。

五、结 语

鉴于学术刊物目前的尴尬状况，我原本应坚持不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这篇文章旨在介绍一些最活跃领域内的研究课题及研究成果，希望从事经济学研究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读者愿意阅读这里介绍的新近发表的论文，从而，或许可改变我们的经济学研究状况。

参考文献

- [1] 汪丁丁, 1996, “产权博弈”, 《经济研究》, 第10期。
- [2] 汪丁丁, 2005, 《制度分析基础讲义 II》, 上海人民出版社。
- [3] 汪丁丁, 2007, “在中国语境里读斯密——为罗卫东《情感 秩序 美德》序”, 收于《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 上海人民出版社, 页93-103。
- [4] Arrow, Kenneth, 1951,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2nd ed., John Wiley.
- [5] Blumer, Herbert, 1986,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6] Camerer, C. and R. H. Thaler, 2003, “In Honor of Matthew Rabin: Winner of the John Bates Clark Medal”,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7, no. 3, pp. 159-176
- [7] Das, P. et al., 2005, “Pathways for Fear Perception”, *NeuroImage* vol. 26, pp. 141-148.

- [8] Fehr and Rockenbach, 2004, "Human Altruism: Economic, Neural, and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Current Opinion in Neurobiology*, vol. 14, pp. 784 – 790.
- [9] Gardenfors, Peter, 1981, "Rights, Games and Social Choice", *Nous* vol. 15, no. 3, pp. 341 – 356.
- [10] Gaertner, W. , P. K. Pattanaik and K. Suzumura, 1992, "Individual Rights Revisited", *Economica* vol. 59, no. 234, pp. 161 – 177.
- [11] Gintis, Herbert, Samuel Bowles, Robert Boyd, Ernst Fehr, 2003, "Explaining Altruistic Behavior in Humans",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vol. 24, pp. 153 – 172.
- [12] Glimcher, Paul W. et al. , 2005, "Physiological Utility Theory and the Neuroeconomics of Choice",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vol. 52, pp. 213 – 256.
- [13] Goleman, Daniel, 1995, "The Brain Manages Happiness and Sadness in Different center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8.
- [14] Henrich, J. and N. Henrich, 2006, "Culture, Evolution and the Puzzle of Human Cooperation", *Cognitive Systems Research* vol. 7, pp. 220 – 245.
- [15] Knight, Frank, 1922, "Ethics and 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6, no. 3, pp. 454 – 481.
- [16] Knight, Frank, 1923, "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7, no. 4, pp. 579 – 624.
- [17] Knight, Frank, 1942, "Science, Philosophy and Social Procedure", *Ethics* vol. 52, no. 3, pp. 253 – 274.
- [18] Knight, Frank, 1944, "The Rights of Man and Natural Law", *Ethics* vol. 54, no. 2, pp. 124 – 145.
- [19] Knight, Frank, 1946, "The Sickness of Liberal Society", *Ethics* vol. 56, no. 2, pp. 79 – 95.
- [20] LeDoux, Joseph, 2002, "The Synaptic Self: How Our Brains Become Who We are", *Viking Adult*.
- [21] LeDoux, Joseph et al. , 2006, "Brain Mechanisms for Fear Extincti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Contribution of Prefrontal Cortex", *Biological Psychiatry*, vol. 60, pp. 329 – 336.
- [22] Mead, G. H. 2005, 《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23] Nelson, William R. , 2001, "Incorporating Fairness into Game Theory and Economics ——

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1, no. 4, pp. 1180 – 1183.

[24] Nowak, M., K. Page and K. Sigmund, 2000, “Fairness Versus Reason in the Ultimatum Game”, *Science* vol. 289, September 8, pp. 1173 – 1175.

[25] Nowak, M., 2006, “Five Rules for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Science* vol. 314, Dec. 8, pp. 1560 – 1563.

[26] Oberman, L. M. et al., 2005, “EEG Evidence for Mirror Neuron Dysfunction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Cognitive Brain Research* vol. 24, pp. 190 – 198.

[27] Pattanaik, P. K. et al., 1997, “Games Forms, Rights, and the Efficiency of Social Outcome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pp. 74 – 95.

[28] Rabin, Matthew, 1993, “Incorporating Fairness into Game Theory and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3, no. 5, pp. 1281 – 1302.

[29] Sally, David, 2001, “On Sympathy and Gam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 44, pp. 1 – 30.

[30] Sanfey, Alan, 2004, “Neural Computations of Decision Utility”,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vol. 8, no. 12, pp. 519 – 521.

[31] Singer, Tania et al., 2004, “Brain Responses to the Acquired Moral Status of Faces”, *Neuron* vol. 41, Feb. 19, pp. 653 – 662.

[32] de Vignemont, F. and T. Singer, 2006, “The Empathic Brain: How, When and Why?”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vol. 10, no. 10, pp. 435 – 441.